

外研社学术文库·翻译研究

# 什么是翻译？ 离心式理论，批判式介入

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美) Douglas Robinson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研社学术文库·翻译研究

# 什么是翻译？

## 离心式理论，批判式介入

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美) Douglas Robinson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2006-0274

© 1997 by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Kent, Ohio 44242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 O. Box 5190, 307 Lowry Hall, Kent, OH44242-0001, U. S. 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翻译? 离心式理论, 批判式介入 = 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 (美) 鲁宾逊 (Robinson, D.)  
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8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5600-8529-6

I. 什… II. 鲁… III. 翻译理论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6429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王莹

封面设计: 袁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mailto: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mailto: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进入21世纪的翻译研究已成为人文社科研究中最具跨学科特质的显学之一。它不仅充分借鉴现代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的批评理论、方法、模式与成果,而且将其学术视野扩展到商务、法律、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出版、传媒、意识形态、电脑科学、国际关系等领域。纵观世界与中国近二十年来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本人深感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后现代拼贴画时代:它不仅有对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传统语言学派的借鉴和反思、扬弃与继承,对现代语言学派、诠释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的开放性评介与梳理,更有不少学者专门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巴西食人主义、谜米学等视角深入探讨翻译研究的各个层面。

本人认为,在东西方翻译研究学者中最能代表“作为跨学科的翻译研究”的翻译理论家非道格拉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莫属。他是当代西方翻译学界思想最活跃、著述最丰硕、文笔最“潇洒”、影响亦相当大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者之一。他通晓英、芬、俄、德、西等语言并从事大量的翻译工作和小说、诗歌、戏剧创作;他颇有建树的研究领域包括翻译理论(如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性别、译者主体、译论史、译员培训)、文化理论(如后殖民性、权力异体间的沟通与表述、文化霸权与文化解放中的性别与阶层、移民主体与边界文化)、19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与文化(如美国现当代文学、美国社会文化史、美国流行文化)、西方思想史(如基督教历史、基督教帝国及其对西方思想史的影响、禁欲主义、权威内化与中产阶级的兴起)、教学艺术与科学(如学习与大脑、整体一人本教学法、职业研修)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宾逊已出版了《美国启示录:美国文学中的世界末日意象》(*American Apocalypses: The Image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985)、《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s Turn*, 1991)、《女性主义时代的男性艺术》(*No Less a Man: Masculist Art in a Feminist Age*, 1994)、《翻译与禁忌》(*Translation and Taboo*, 1996)、《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1997)、《谁在翻译?超越理性的译者主体性》(*Who Translat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 2001)、

《行动语言学：作为话语行为的言说与翻译》(*Performative Linguistics: Speaking and Translating as Doing Things with Words*, 2003)等多部具有创意和独到见解的作品。本人尤其“偏爱”鲁宾逊那些学术视野开阔、观点新颖、文笔老道、绝少受任何理论流派约束的著作。《什么是翻译？离心式理论，批判性介入》(*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1997)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此书由三大部分（内分11章，外加作者“前言”和“结论”）构成。鲁宾逊首先对译界十年来不断涌现出来的“离心式”开拓之作（如反传统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译论）表示欣喜和赞赏，同时又尖锐地指出它们所包含的各种意识形态和研究方法上的复杂问题。他认为，尽管每一部新著都为译界读者/学者提供了各种交流、辩论和拓展的可能性，但新旧问题却常常纠缠在一起。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他非常想“跳进战壕”，帮助作者拓宽理论的边界，批判他们，解构他们，分析他们的缺陷，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他们“手上的研究项目”向前推进。现在就让我们简要概述《什么是翻译？离心式理论，批判性介入》一书的主要内容，看看鲁宾逊是如何对这些“离心式理论”进行“批判性介入”的。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鲁宾逊《什么是翻译？离心式理论，批判性介入》一书的基本思路。本书是由阿尔布雷克特·诺伯特（Albrecht Neubert）教授（德国莱比锡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格里戈里·施里夫（Gregory M. Shreve）教授（美国肯特大学应用语言研究所所长、现代及古典语言研究教授、翻译理论家、“经验翻译研究”倡导者）为美国译协联合主编的“翻译研究系列丛书”的第四部。除丛书“编者序”外，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为本书撰写了言辞精辟、观点独到、评价中肯、颇具参考价值的“序言”。丛书主编诺伯特和施里夫在“编者序”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把鲁宾逊《什么是翻译？离心式理论，批判性介入》纳入丛书就是为了拓展当代译学的研究范围，挑战我们对“什么是翻译”、翻译研究的实质、形式与方法等层面的固有思维模式。与此同时，把鲁宾逊对超越传统语言学研究之当代译学的最新思考呈现给读者，让大家“听到翻译研究里独一无二的声音，一个大胆探索翻译行为本身的文化内涵和个体意义的声音”。鲁宾逊在本书中选择了西方国家1985至1995这十年间较具代表性的九部翻译理论著作和一篇文章分专题进行了综述、评介、批判和富有创意的进一步探讨。鲁宾逊是一位善于把译学理论与翻译实践联系起来、特别喜欢标新立异的学者。

在本人看来，他谓之“离心式理论”（centrifugal theories）的概念其实包含两个层面：1）与“向心式”（centripetal）理论/概念相对，主要指新的、非传统、非经典的发散式思辨模式与方法；2）与“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视角相对，主要展现解构、非中心、颠覆式的研究企图和效果。鲁宾逊对弗雷

德里克·勒内 (Frederick M. Renner)、丽塔·科普兰 (Rita Copeland)、埃里克·柴菲茨 (Eric Cheyfitz)、安德烈·勒弗维尔 (André Lefevere)、安东尼·皮姆 (Anthony Pym)、苏珊·吉尔·莱文 (Suzanne Jill Levine)、米莉安·迪亚兹-迪奥卡雷兹 (Myriam Díaz-Diocaretz)、安托万·贝尔曼 (Antoine Berman)、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菲利普·刘易斯 (Philip Lewis) 等人的“离心式”译学新论的一一解剖,充分表现了他犀利的、极具个人主观色彩的“批判性介入”。根茨勒在“序言”中对鲁宾逊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鲁宾逊具有一种令人敬畏的“直捣问题核心并将其摆上桌面”的超常能力。他的研究往往无视学术传统的清规戒律,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后结构主义思辨和主观、散文式修辞写作风格。尽管书中的论题较新而且很有理论上的难度,鲁宾逊还是以读者为先,深入浅出地呈现他的论证过程。因此,无论是文化研究者、翻译实践家,还是文学研究者、译学理论家,他们都会发现此书信息量丰富且具挑战性和争议性。而鲁宾逊的贡献之一便是在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对话与沟通的桥梁。

### 第一部分：重绘修辞与语法

此部分包含三章:鲁宾逊把“文艺复兴”、“中世纪”和“殖民冲动”作为主标题分别评述了勒内的《释:从西塞罗到泰特勒的语言与翻译》(*Interpretatio: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from Cicero to Tytler*, 1989)、科普兰的《修辞、阐释学与中世纪的翻译》(*Rhetoric, Hermeneutics, and Trans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1991)和柴菲茨的《帝国主义诗学:从“暴风雨”到“泰山”的翻译》(*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 Translation from The Tempest to Tarzan*, 1990)。鲁宾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尽管1985至1995这十年间翻译研究一派生机,译学范式日新月异,力作不断问世,令人目不暇接,但许多所谓“旧的”、“传统的”、“霸权的”、甚至那些用了数百年(比如“修辞/翻译法”)的理论与方法并未寿终正寝,甚至远未完全发展和完善。第一部分所选取的这三部著作从不同的角度、以愈加激进的政治姿态探讨了翻译中的修辞和语法问题。三位作者都把目光投向历史:勒内关注从古罗马的西斯罗到19世纪末的泰特勒这一时期,科普兰选择了中世纪,而柴菲茨则把重点放在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时期。

鲁宾逊总体比较肯定勒内在《释:从西塞罗到泰特勒的语言与翻译》一书中对从西塞罗、昆体良、贺拉斯等到泰特勒这些翻译(理论)家、语法修辞学家对语言和翻译的种种论述所进行的系统梳理和评判:第一部分“语法:译者的基本工具”;第二部分“修辞:译者的修饰工具”(下分“语法及其范畴”、“修辞及其范畴”、“作为语法学家的译者”、“译者与修辞”);第三部分“作为艺术(arts)的翻译与作为艺术家(artifex)的译者”。鲁宾逊认为,勒

内著作的过人之处便是他从西塞罗、贺拉斯、泰特勒这些学人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数以百计的、往往已被人们忘却了的只言片语或偶发论述中构建和绘制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a unified theoretical foundation)。这条建立在语法(“结构”)和修辞(“修饰”)二元基础之上的古典语言理论,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勒内的著作,而20世纪的学术传统却否认文艺复兴之前的这一“统一性”或翻译理论的存在本身。勒内指出,这些“古典”学问家都恪守一个极其相同的翻译原则:无论来自哪个时代,译者在翻译时都要首先从译意/译词开始,然后判断句子是否合乎语法,最后利用修辞对译文进行润色加工。鲁宾逊指出,勒内在构建这一“统一体系”时,把这1,800多年间的理论家和学人不分先后或历史背景,统统以同样的方法来处理,并有意把那些不符合这一传统的理论和翻译家的观点排除在外,忽略了“地方差异”和“历史变化”。在鲁宾逊看来,勒内有意“漏掉”、“排斥”或“忘记”那些被殖民者和女性译者(如 Elizabeth Tudor, Cooke 姊妹们, M. M. Roper, M. Sidney, M. Tyler, Aphra Behn 等),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说理力和研究的权威性。实际上,勒内对中世纪的翻译理论和历史人物的轻描淡写,延续了文艺复兴把中世纪解读成“文化真空”和“无知的黑夜”的“殖民态度”。此外,勒内的大部分论述只围绕语言的语法、翻译的技巧和修辞(“一个稳定的系统”)等问题,几乎完全回避社会、政治、权力、文化对翻译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尽管如此,鲁宾逊还是认为,勒内略带16世纪人文主义色彩的系统研究对我们重新认识语法和修辞学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有很大的帮助,他个人对这一体系在西方思想和文化上的霸权地位一直很感兴趣,在《译者登场》的前半部分和《翻译与禁忌》对此皆有论述,但与勒内细致的研究相比,自己仍显急躁,应从勒内的书中汲取养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普兰的《修辞、阐释学与中世纪的翻译》从结构主义角度对中世纪翻译理论的探讨是对勒内研究的补充。鲁宾逊认为,科普兰的贡献在于她把翻译放在中世纪阐释实践与修辞理论相交的历史语境里,通过对特定情境里中世纪“方言/本土文化”与“拉丁学术文化”之冲突的研究,成功超越了方法论上的陷阱。她认为,翻译可作为本土对拉丁学术话语的挪用工具,在中世纪早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对翻译理论修辞价值的研究。鲁宾逊非常欣赏科普兰对罗马时代翻译理论、后古典时期修辞与语法的冲突、中世纪时期修辞的本质、世俗文学翻译在中世纪的翻译修辞和阐释系统里的位置、以及英法翻译理论与修辞创新和阐释学传统等方面的系统论述。他认为,科普兰的著作资料翔实,包含丰富的原文引用和作者自己的翻译,对中世纪翻译理论的研究有独到之处,是本领域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在鲁宾逊看来,《修辞、阐释学与中世纪的翻译》的缺点主要有二:第一,科普兰对议题的复杂性描述过于繁琐,缺少必要的梳理,而且分类界限不清晰,过分依

靠重复,可读性大打折扣;第二,毫无疑问,科普兰也读过足够多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在她的论述过程中也试图解构翻译二元对立任何一极的观点和方法,但她往往又掉入二元论的思维模式,这表明作者的批评基石不够坚实。鲁宾逊还指出,科普兰尚缺乏社会心理学的素养,对推动传统与创新的受控集体、抵抗性个体与团体动机等认识不足,意识形态的能动者在她的论述中游弋而模糊。然而,科普兰的研究乃本领域的开山之作,丰富而又难得。以此为向导,中世纪翻译的社会史(包含社会阶级、经济、土地管理、性别等)和政治史(如政治与宗教关系、“个体”身份构建、征服与帝国、欧洲与世界地缘政治等)的研究指日可待。

鲁宾逊把柴菲茨的著作《帝国主义诗学:从“暴风雨”到“泰山”的翻译》放在科普兰之后是非常合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提供了欧洲16、17世纪修辞、语法与翻译的帝国政治史研究。《帝国主义诗学》运用后结构主义的“下属研究”理论(subaltern studies)及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等的后殖民批评话语,研究了修辞、语法与帝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鲁宾逊所言,柴菲茨的作品“冲开了许多紧闭的大门,读起来让人头昏目眩”。柴菲茨激进地批判传统的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绝对不只是语言文学意义上的语法修辞问题,而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政治渠道,这尤其体现在16、17世纪欧洲对“新世界”的殖民过程当中。由于他涉及并引用了大量的关于“北美土著人”(Native Americans)的历史事实和各类作品而自己又不懂他们的语言,因此只能用他所批判的翻译作品来表述及论证他的观点。鲁宾逊指出,这正是身为不懂“北美土著人语言与文化”的欧洲白人男性学者的柴菲茨所面对却又无法逾越的“方法论上的鸿沟”(methodological abyss)。正因为如此,柴菲茨只能在欧洲与“他者”的身份认同、文明与“野蛮”、内闭与离散、正常与异类、书面语与口头语、资本主义与族缘秩序等话语系统的矛盾和冲突中游弋。

## 第二部分:深入系统内部

此部分共分四章,以“众多系统”、“个人化过程”、“痛与玩”和“译者一功能”为题分别评述了勒弗维尔的《翻译、重写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1992),皮姆的《翻译及翻译教学中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and Its Teaching*, 1993)、莱文的《颠覆性作家》(*The Subversive Scribe*, 1991)和迪奥卡雷兹《翻译诗的话语》(*Translating Poetic Discourse*, 1985)。根茨勒在“序言”中指出,鲁宾逊向来“蔑视”关于翻译的那些传统思维模式,而且他乐此不疲。在肯定那些翻译新论的同时,他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包括北美的韦努蒂和(已故)比利时(后移居美国)的勒弗维尔等著名的翻译理



论家。他细致分析这些理论家们所代表的“流派”，尖锐地将那些理论赖以成立的某些假设“问题化”（problematised）。

鲁宾逊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最令人满意的发展变化之一便是转向对翻译的社会政治层面（如意识形态、权利、地位等）问题的研究，这不仅使翻译研究摆脱了过去只从字、词、句、篇章、语法、修辞、风格、美感等脱离社会现实的翻译形式和纯翻译技巧层面的研究，而且从根本上解放了翻译理论，促使人们克服了惧怕触犯“翻译禁忌”的心理。因此，当翻译研究不再是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的时候，对翻译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便成为可能。然而，由于这些年来各种新论的大量涌现，译界便面临许多方法论上的危机。鲁宾逊通过对勒弗维尔、皮姆、莱文和迪奥卡雷兹的四部译学新作的评述，对西方翻译理论中有关社会问题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独到的探讨。鲁宾逊尤其关注这些“离心式理论”当中“系统性”与“片段式”、“科学、客观”与“个体、主观”、“高度抽象、宏大”与“具体、本土”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对立关系。

我们知道，“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s theory）是著名以色列学者伊文-佐哈尔（Even-Zoha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它强调翻译文学是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运作的：作品选择、翻译规范、行为策略都是如何受各种相关系统影响的，译作在目的语文化系统内又有怎样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标志着翻译研究从单一文本研究走向了在文学、社会、政治、文化系统内的研究。这一理论影响了包括后来移居美国的勒弗维尔在内的许多欧美及亚洲学者。在《翻译、重写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中，勒弗维尔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翻译的社会问题。他把翻译看作“重写”，把翻译研究当作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分支；通过重写和其他活动，文化系统便被创建出来。因此，他认为“我们的文学世界”是通过诸如翻译、批评、编辑、选辑、撰写文学史等社会性活动而构建的，权力、意识形态、机构组织、系统内外的人士/赞助者、经济与地位、主流诗学等因素系统地支配着对文本的接受或拒绝，同时，它们也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这样，作为“重写”的翻译也就被放置在了“系统建设”的重要地带。勒弗维尔主张采用描述而非规定性的方法来研究种种翻译现象及影响文本接受的复杂因素，对翻译的优劣不做任何价值判断，那是读者的事儿。鲁宾逊指出，勒弗维尔立足于他本人构建的系统理论之内来谈系统理论，这无疑让他能够看见系统外的理论家看不见或不太关注的东西，很少系统理论家能像他那样凸现那些隐含的系统模式，然而，这个系统内的视角也在其他方面限制了他。鲁宾逊认为，勒弗维尔看似客观、科学、中立的关于系统理论（尤其是权力）的概念，实际上是“官僚化的”（bureaucratized）、居高临下的概念，它充满了尼采称之为“权威内化”的色彩，也就是鲁宾逊在《译者登场》中所说的

翻译的“意识形态身体学”(ideosomatics)。纵观勒弗维尔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系统诗学的“系统化过程”(codification)、意识形态与译者及赞助人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鲁宾逊直言,“系统论思维”在西方一直占据霸权地位,是一种提高我们分析社会模式能力的有利工具,但它对系统内的动态变化给系统本身带来的挑战尚缺乏解释力,并且高度抽象,忽视个体经验的创意和多样性。不过本人认为,勒弗维尔是一个有创意的多元系统理论家,即使在今天,他与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翻译、权力、机构组织、历史、文化等方面关于“文化转向”的研究仍让我们常读常新。

与勒弗维尔不同的是,皮姆的《翻译及翻译教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和勒温的《颠覆性作家》均偏向于个人的主观感受,虽然勒弗维尔和皮姆都关注翻译的具体行为与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皮姆的《翻译及翻译教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是根据他1992年在西班牙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大学举办的研讨班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编辑而成的,因此,全书有极强的口语特点。如鲁宾逊所言,此书的一大缺憾就是皮姆站在西方传统学术思维那些霸权范式之外,确实冒着“看起来懒散、愚蠢、迟疑、不置可否”的风险,易让大多数系统论学者感到莫名其妙和厌烦。皮姆自喻为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他以“玩理论”和讲故事的“非系统论”的方式,透过个人的好恶、个人的经验、个人的发现,从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各种问题。他认为翻译是一个开放式的、渐渐演变的个人化过程,是文本意义永恒运动的符指模式(semiosis)。他把符号学意义上的实际翻译过程与日常生活的个人再现区分开来。在这本书中皮姆并不是要告诉人们怎样去翻译,而是译者应该怎样表现自己,如何向雇主展示一流的翻译能力,如何真正“玩好”作为译者的游戏。皮姆说,作为跨文化社区成员的译者,最根本的就是肩负起文化沟通者的使命,为那些因语言障碍无法接触其他文化的人带去互动的机会,让他们增长知识。鲁宾逊认为,这便是皮姆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它拓宽了系统论和个人化译学的研究方法。

在鲁宾逊看来,勒温的《颠覆性作家》是一部具有爆炸性能量的力作,它深受西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理论的影响,文中常常引用弗洛伊德、拉康、本杰明、德里达、德曼、布罗斯基及其他理论家。同皮姆的“个人化”译学观点一样,勒温也充分挖掘她个人的译论阅读心得和她对“颠覆性”拉丁美洲小说进行“颠覆性”翻译处理的经验,大胆挑战那些把翻译矮化、女性化和边缘化的种种观念和企图。她认为,译者决不是原文的奴隶、女仆和传声筒,也不需要把原著奉为神明,相反,他们可以摆布、改写、颠覆原文。她呼吁译者摒弃传统观念,从魔咒般的依附性和从属性中解放出来。同时,她也近乎残酷地解剖自己。她坦白地说,在翻译那些把女性当作奸诈、背信弃义的他者来表现的作品时,

她自己也成了—个被男性话语俘虏并出卖了自己的女人。鲁宾逊把这称之为“居于文明社会的逃犯或野蛮人”，是一种“内部流放”（internal exile）。因此，相对于翻译理论的主流来说，勒温的颠覆性译论和实践适用的范围就相对狭隘。然而，勒温相信，通过颠覆性翻译和讨论，我们在进行批判性实践。在勒温这部作品问世16年后的今天，这种探索精神仍然对我们有震撼力。

本部分最后讨论的是智利女诗人、批评家、翻译家迪奥卡雷兹的《翻译诗的话语》，这也是鲁宾逊本书所评述的九部著作中最早发表的一部。他认为迪奥卡雷兹的翻译观介于“系统理论”（如：勒弗维尔）与“个人化”（如：皮姆、勒温）两种研究方法之间，她既是多元系统理论家，雅各布森学派的交际理论家，同时也是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诗歌的主要西班牙文译者，西班牙语世界里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在《翻译诗的话语》中，她对翻译中“译者的功能”作了详尽探讨，同时，以她自己翻译的一个同性恋女诗人的情诗为例，细致分析了霸权翻译和反霸权翻译（如父权制下的异性恋文化与反叛的女性主义同性恋文化）之间的冲突。鲁宾逊对其“译者—功能”的理论（即多种社会、文化、政治因素对译者的限制）探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在系统理论与个人化两类翻译研究方法之间架起了十分有用的“概念性桥梁”（conceptual bridges），其批判力直捣权力的核心，尽管这种融合二者的企图在书中往往不够连贯，让人混淆。鲁宾逊指出，从迪奥卡雷兹的女权主义翻译观和其他后殖民主义批评可以看出，影响译者翻译的各种因素决不仅限于具体的“技术”决策问题，而应将其扩大至不断拓宽的意识形态领域。是异化自己的翻译并有可能疏远许多潜在的母语读者，还是收起自尊、就范于霸权、产出被主流话语同化了的译文，这是摆在译者和翻译理论家面前的“伦理抉择”（ethical choice）。

### 第三部分：拥抱异化

近二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大讨论。鲁宾逊认为，虽然关于“直译”（literalism）的论述和实践从古（如安德尼罗柯、西塞罗、哲罗姆等）到今（本杰明、海德格尔等）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场“直译—意译”、“异化—归化”的论争对当代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宾逊在讨论几位主张“异化”翻译的代表人物贝尔曼、韦努蒂和刘易斯的理论之前，把作为翻译实践的直译和作为“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a utopian social movement）的直译（异化）进行了简要的区分，而他在本部分所关注的是后者。

鲁宾逊首先讨论了贝尔曼的著作《经历异质：浪漫主义德国的文化与翻译》（*L'Épreuve de l'étranger*, 1984，英译本：*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SUNY Press, 1992）。这是一本影

响了包括韦努蒂、鲁宾逊等在内的许多当代翻译理论家的力作。正如鲁宾逊所言,贝尔曼的名字、贝尔曼的作品、贝尔曼关于“文本变形系统”及“对话式翻译法”(dia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等的论述在翻译学界随处可见。贝尔曼在《经历异质:浪漫主义德国的文化与翻译》中提出了“保留他性”(maintain alterity)的异化翻译理念。他认为,把一部外国作品的异质性“系统地抹掉”(systematic negation)是糟糕的翻译;翻译应该尽量保留原作的外来特性和异域的痕迹,通过借词和造词等形式进行一种“创造性的移植”(creative transposition)。这样,翻译的纯粹目的就达到了:在与他者的对话中改变自己。由于贝尔曼主张译者在保留他性的同时也要使译文“可读并有活力”(readable and vigorous),既反对那种句法和语义上都死抠的“不透明直译”(opaque literalism),又主张译者翻译决策时不用关心读者的理解力问题,鲁宾逊对此感到困惑并认为,如果译者真的不必关心读者的接受能力,贝尔曼又有什么理由反对“不透明直译”呢?本人认为,鲁宾逊似乎忽略了贝尔曼法国式的“中庸之道”:为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适当的异质保留,也就是“对话式的他性”(dialogical alterity),译者(尤其是文学译者)自己要把握好分寸(drawing the dividing line)。当然,贝尔曼把他性和异质看成是译作的灵魂,是“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的原动力。鲁宾逊认为,贝尔曼这种浪漫的情怀和理想追求无疑折射出法国当代文化想极力摆脱近半个世纪以来德国民族主义给法国带来的民族中心主义的负罪感。如果他可以赢得读者的追捧,把德国浪漫主义当作“他者”,使法国文化找回自古典主义之后就已失去的形象和经验,便可以开始迈向浪漫想象的乌托邦未来了。在本章的最后两节,鲁宾逊以“异化贝尔曼”和“异化与外来词”为题就斯蒂芬·海维特(Stefan Hayvaert)译本的得与失和异化与归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鲁宾逊在本部分讨论的第二位翻译家是韦努蒂,他用了一个有趣的标题——“异化流畅”。众所周知,韦努蒂是当代美国译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在翻译的异化/归化问题和作为(对霸权式规范)抵抗的异化研究方面有持续的深度研究。从1986年发表论文《译者的隐形》到1995年出版专著《译者的隐形: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韦努蒂都坚信翻译的研究范围不仅要包括语言和文学的规范,更应涵盖文化的价值观、信仰及社会表达方式,以便探讨政治、社会、文化框架内译者的状况和活动。在“译者的隐形”中,他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并批判了自17世纪以来在西方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归化翻译现象/传统。他为此感到痛心,认为归化翻译根据种族中心主义思想,迫使外语文本符合英美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是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语言上的一种霸权行为。如果我们要反对译入语对原文的这种霸权,就必须反对“通顺自然”的归化翻译,反对译者在翻译中的隐性身份。把异化方法视为一种对目的语文化价值观的种族偏离性压力,

充分显示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异质性，把读者推到国外。他主张一种抵抗式的异化翻译，要求译文具有一种不流畅或疏离的风格，使其不受译入语文化的支配，借以凸现译者的存在和身份。但是，鲁宾逊认为，韦努蒂倡导的异化翻译观是一种带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文化精英主义，他的译者是（精英而非大众）文学翻译者，服务对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而他们阅读这些译本是为了瞥见“一个文化的他者”（a glimpse of a cultural other）。这里，鲁宾逊指出了韦努蒂的理论和其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一方面以抗拒流畅的主张来反对翻译研究中的霸权式话语和规范，一方面又以极为流畅的文笔和口才（演讲时）完全不加抵抗地迎合学术写作里的霸权式规范。而韦努蒂对此缺少应有的自觉意识。当他以华丽的修辞风格探讨具有如此争议的论题时，他往往抑制了自己的离心式冲动和多声性思辨（polyvocality）。他是一位十足的主流理论家，无法真正庆贺“边缘”或拥抱异化。此外，鲁宾逊还结合韦努蒂的理论与实践上的瑕疵谈了“超越学术话语”、“盲目与虚伪”、“流畅的具体化”、“理论的精英主义”等议题，而鲁宾逊承认这不仅仅是与他非常喜欢和欣赏的韦努蒂商榷，也是他个人的告白：把翻译理论界过分流畅清澈的河水搅浑一下。

同贝尔曼和韦努蒂一样，刘易斯也反对归化翻译，但他似乎更激进，更关注译者在操纵原语言和目的语言之后的异化效果。他在《翻译效果的判断》（*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s*, 1985）一文中提出了“虐待式翻译”（abusive translation）的主张。刘易斯借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一个“好”的译文一定会施虐（commit abuses）或耍花招（play tricks），并对abusive一词进行了语言上的解构。他认为，软弱和奴隶式的翻译源自我们对德里达称之为“白人神话”的特权的认同，而虐待式翻译能够把译者从受控制的惯用法系统（the use-system）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译者要通过反惯用法（abuse，即虐待式翻译）来抵抗传统的翻译方法。对刘易斯而言，这种翻译既可以不尊重原语言也可以不尊重目的语言的惯用表达方式。这当然不是漫无目的地乱虐一气，而是通过找寻并有节地调控文本的“中心要点”和“力度集结点”，创造一种在意义、调性、期望、结果等方面都有变化、甚至比原文本更有震撼力的译作。鲁宾逊认为，刘易斯的虐待式翻译观有三个问题：1) 对强势/虐待式翻译的过分激情显示出他对霸权暴力的理想化；2) 在“谁或什么被虐待”、“如何被虐待”、“有什么社会或心理上结果和影响”等问题上没有清晰论述；3) 虐待式翻译观过分抽象难懂，有典型的后结构主义思辨的局限性。鲁宾逊在这一章里，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他翻译一部充满暴力的芬兰剧本《风雨飘摇的房子》（*Tottering House*）的心路历程及其对刘易斯的虐待式翻译观的思考。

鲁宾逊坦言，本书的第十章“异化与幽灵之臂”（*Foreignism and the*

Phantom Limb) 的灵感来自奥利弗·萨克斯 (Oliver Sacks) 那本描写神经奇想的书《把老婆误当帽子的男人》(*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它本身与鲁宾逊要讨论的翻译理论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让他得到源源不断的启发，并重新思考翻译的许多问题：韦努蒂很善于谈论宏大的社会政治趋势，但异化翻译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异化与归化翻译的中间地带又是怎样一番景象？作者、译者、(译入语) 读者所面临的各种“幽灵”是如何影响文本的创作、翻译和阅读的？这些“幽灵之臂(腿)”又是怎样配合的？其实，鲁宾逊在他的《谁在翻译？超越理性的译者主体性》一书里对译者的主体和受制约的各种要素(他称之为 demons) 有系统而精彩的论述，此处恕不赘言。而全书的结论部分“神经网络，同步性与自由”(Neural Networks, Synchronicity, and Freedom) 的灵感同样来自一本与翻译无关的作品——威廉·奥尔曼 (William Allman) 的《创造奇迹的人：走进神经网络革命》(*Apprentices of Wonder: Inside the Neural Network Revolution*)。鲁宾逊从后殖民主义和新的激进翻译理论的视角，结合“神经网络”科学的成果与数码电脑技术的未来发展，对机器翻译进行了技术、传统、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评述，认为机器翻译无法真正代替有思想、有想象力、渴望自由、永远在寻求不同方法和策略的“人类译者”，而新的离心式理论(鲁宾逊反对把它们看作是“边缘理论”)不仅可以促使我们反思那些翻译理论的规范，而且要求我们解放自己、改变现实。

纵观鲁宾逊的这部在理论深度、跨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极富挑战性的著作，让我最喜欢的地方有三点：1) 他对离心式理论的跨学科思考，墨守成规就是他的天敌；2) 他在翻译理论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意识，永远在理性和细致论证的传统方法与散文和随感式的个人化批评方式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切入点；3) 他超越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企图和天马行空的率真与人文关怀，他敏捷的才思、入木三分的洞察力、极富挑战/挑衅的个性(甚至傲慢与偏激)都处处跃然纸上。总之，这是一部个性鲜明的跨学科翻译学著作。正如根茨勒在本书“序言”中所说：“鲁宾逊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在批评与创造性写作之间，找到了提出问题并挑战我们思维的空间……。他的思考富有成效，为当代翻译理论家和实践者正面临的某些最棘手的难题提供了有见地的新视角。”

这是一本适合高校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等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学者阅读和参考的好书。读起来有些难，放弃它也许就更难。

## 参考文献

- [1] Robinson, Douglas. *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 [M].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Robinson, Douglas.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Ltd, 1997.

[3] Robinson, Douglas. *The Translator's Turn* [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Robinson, Douglas.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Ltd, 1997.

[5] 陈宏薇. 道格拉斯·鲁宾逊以人为中心的翻译教学思想评介 [J]. 中国翻译, 2006 (2): 45-50.

[6] 马会娟. 一部评价近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的书 [J]. 福建外语 (现改名为外国语言文学), 2001 (3): 67-71.

[7] 谭载喜. 导读. 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道格拉斯·鲁宾逊著.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8] 谢天振, 陈浪. 导读. 在翻译中感受在场的身体. 译者登场. 道格拉斯·鲁宾逊著.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毛思慧**

澳门理工学院英语文化研究教授

# Editors' Foreword

Albrecht Neubert &  
Gregory M. Shreve

Douglas Robinson's *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is the fourth volume of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The basic editorial strategy of the series is to present a broad spectrum of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and to challenge our conceptions of what translation is and how we should think about it. We have included *What Is Translation?* in our series to quite deliberately push the envelop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far as we can. We want the series to open up our readers' minds to the different forms of scholarship that can emerg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Douglas Robinson is a dynamic figure in a rapidly emerging "American" school of humanist/literary translation theory. He is a provocative writer, with a style that combines erudit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cholarship with highly personal, often anecdotal, argumentation. As Edwin Gentzler points out in his excellent introduction, Robinson is a unique and valuable voice in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y, difficult to categorize, impossible to ignore.

The purpose of our series is to present as many voices as possible, including those with whom we might disagree on important issues. We, for instance, continue to challenge Robinson's apparently deep-seated conviction that outside of the pantheon he cites in his preface and throughout the volume (Venuti, Levine, and Lefevere, among others), very little of value has been done to "open up" translation theory beyond the confines of its linguistic origins. There is still a tendency to center his conceptions of "translation theory" on developments within a rather restricted circle of activ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writing about literary translation. Everything outside of this circle is not actually dismissed, but mostly ignored, as prescriptive and slavishly linguistic. This constriction of the rang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s a flaw in his work, even



though, in this volume by opening up to the polysystems theorists and the *skopos* school, Robinson is inviting in more of the wide world of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y to inform his own perspectives. Nevertheless, the purpose of this foreword is not to grapple with Douglas Robinson over issues with which we disagree. The purpose is, instead, to present to you, the reader, an opportunity to hear a unique voic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voice that boldly explor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personal meaning of the act of translation itself.